

幕友生涯：清代读书人的“奥德赛时期”



汪辉祖

寒士何以入幕

清代取士，三年一科。中举之后还要再过会试、殿试，即便中了进士，也要候铨数年才补得到实缺。至于举人、贡生、生员，名分上是士，经济上却毫无保障。汪辉祖年幼丧父，家贫，因岳父任金山县令，故往佐书记。一个穷书生靠亲戚关系入幕，从此踏上佐治之途。有趣的是，他父亲早年也业儒未竟，治法家言，依人幕下。可见，这是寒门书生代际相承的一条出路。

一般来讲，清代州县衙门的正印官只有一员，麾下既无独立的法务，也无独立的财政。所有诉讼、命案、钱粮、漕运、文移，都压在正印官一人身上。而官员是流官，三年一任，多是异乡人，律例与风俗皆不熟。按照回避制，又不能用本省人。于是只能自掏腰包，请幕友分担。幕友因此被粗分为几门：“刑名”专办词讼审转，是修金最高的一席；“钱谷”管赋税漕粮；“书启”代撰文书；此外还有挂号、征比、账房等。

但这些都不是寻常举人能立刻胜任的本事。要做合格的刑名幕友，须读熟《大清律例》数百条、加上千百例案与无数省例部章。汪辉祖回忆自己在常州太守胡公幕中初学刑名：“闲以余力读律令，如有会心，稍为友人代理谳牋，胡公契焉。”他白天替主人写应酬文章，夜里苦读律例。王又槐《办案要略》更直言道：“办案如造屋，门窗椽柱及屋内器皿均须周备。案中应有不可减，应无不增。”读书人写八股惯了铺陈虚词，到了幕席上才发现，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人命与赋税，落笔之处即关人之生死、家之倾覆。

汪辉祖以刑名学为业之前，还有一段动人的家中对话。最初，嫡母与生母闻知此事齐声反对，理由是“汝父尝试为之，惧其不祥；今吾家三世单传，何堪业此”。父亲做过幕友、知其不祥，如今家中三世单传，怕承不住此

“奥德赛时期”(OdysseyYears)本是评论家戴维·布鲁克斯近年的一个说法，用来命名当代年轻人在20到35岁之间那段并不安顿的日子。他们已经走出校园，却还未真正进入婚姻、职业与家庭的稳定轨道；不停换工作、换城市、换身份，像荷马笔下漂泊海上的奥德修斯，离故乡很远，离归宿也很远，却正是在这一段长长的中间状态里，慢慢长成日后的自己。而在清代，也有着这样一群身处于奥德赛时期的人。那些已经过了童试、乡试，读书已成，却又久居场屋、不得一官的中年士人，他们识字、能文、通律，却无所归属。既非衙门正员，也回不去做田舍翁。为了砚田自给，他们打点行装，离开故乡，到各州县官的私署里去做“幕友”，俗称“师爷”。少则三五年，多则三四十年，主人换过十几个，足迹遍及数省。这就是所谓“游幕”。

著名幕友汪辉祖在乾隆五十年(1785)回忆自己的入幕生涯时写道：“余遂以刑名学入长洲幕，时乾隆二十五年也，迨于今二十有六年矣……二十六年之中未尝一日投閒。所主者凡十四人。”二十六年，十四个主人。这就是清代士人的奥德赛。更为悲剧的是，它并非事业有成之前的一小段过渡，而往往是一个人壮年的全部。本文便以汪辉祖《佐治药言》及《官箴书集成》所收数十种幕学、宦游之书为线索，看这群读书人如何在他人衙署中度过自己漫长的“奥德赛时期”。

业的因果。汪辉祖跪而对策：“儿无他长，舍是无以为生。惟誓不敢负心造孽，以贻吾母忧；苟非心力所入，享吾父或吐及不长吾子孙者，誓不敢入于橐。”凡非他靠真本事挣来的钱，他都发誓绝不揣进自己腰包。两位母亲方才答应，又叮嘱一句：“天高听卑，鬼神皆知之矣。”

从这一场堂前问答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对“幕友”的印象，他们是以笔代耕的体面行当，却又游走在律法、金钱与人命之间，稍一失手便造孽。体面而又危殆，富裕而又孤危。这是民间对这一行的评价，也是奥德赛真正开始之前，每个游子心里都要回应的问题。

不合则去的伦理

入幕之后的日子，是真正的漂泊。

幕友与主人之间没有官身名分，更像是私聘的契约关系。幕友的工资虽然可观，在江南繁剧之区可至千两以上，偏远小县也有数百两，足以超过翰林十几年的俸禄，然而这份工作极不稳定。主人卸任、调任、丁忧、被劾，则幕僚立刻失业。主幕意见不合，亦可能挂冠而去。汪辉祖二十六年间换过十四位主人，平均不到两年一动，家眷或留萧山，或随主人移宦各地。

在这种无身分的生涯中，汪辉祖总结出了属于幕友独特的伦理——“不合则去”：“宾之与主，非有势分之临也。合则留，吾固无负于人；不合则去，吾自无疚于己。如争之以去就，而彼终不悟，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。吾又何所爱焉？故欲尽言，非易退不可。”

这是清代幕道的核心。幕友凭一身技艺为生，正因为不靠主人的恩荫，他才敢在事关人命与公帑时说真话；而随时能挂冠，正是他敢尽言的底气。所以汪氏在另一节里又说：“凡居官者，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；而僚仆胥吏，类皆颐指气使……惟幕友居宾

师之分，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，复礼与相抗，可以剴切陈词。”

幕友既非言官、又非御史，但他可以在主人耳边一日数次、一年百次剴切陈词。许多今天看来循吏可观的清代政绩，背后都有一位无名宾师在做反复劝谏。

但尽言的前提，是先要立品。汪辉祖说：“信而后谏，惟友亦然。欲主人之必用吾言，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。”幕友不在体制名分内，却时时握有事关人命与公帑的笔。若与本地士绅、富商、差役勾连，立刻沦为“棍幕”。所以幕学书反复申说“勿过受主人情”、“不宜经手银钱”、“勿轻易金差”，公私之间必须划得清清楚楚。

因为没有归属，所以可以诚实；因为可以诚实，所以才有继续上路的意义。

笔下的世道：刑名、人命与造孽的边界

如果说宦海是漂泊的洋面，刑名审转便是其中最凶险的暗礁。

幕友每日的工作大致分作四层：核审诉状、整理口供、草拟看语(判决书)、详转上司核覆。王又槐《办案要略》开篇即说：“办案总要脚踏实地，无凭据不入详，有疑心不落笔。”看似平常的十四个字，实则是无数冤狱用人命换来的教训。清代州县每年要办大量户婚田土小讼，亦不乏盗、命、奸、毒大案。上司有驳案之权，幕友若有半字浮夸虚饰，便会牵连主人议处、自己失业。

汪辉祖《佐治药言》中列出过几十条具体规矩：如“妇女不可轻唤”、“命案察情形，盗案慎株累”、“勿轻引成案”、“囚关绝祀者尤宜详审”。而每一条背后都对应着一类容易冤滥的情形。“妇女不可轻唤”，是因为清代妇女一旦涉讼往往受辱不可洗，故宁缺勿滥；“盗案慎株累”，是因为差役借盗案敲诈邻里之事极多；“囚关绝祀者尤宜详审”，是因为该犯一死即家族绝嗣，须慎之又慎。这些规

矩组成了清代地方司法中一套不入律典、却比律典更细的裁量伦理。它们是幕友群体在漫长游历中口耳相传、写为札记、刻入家训的“私伦理”，但在实际治理中，往往比律例本身更深地影响着一方百姓的生死哀荣。

高廷瑶《宦游纪略》中记录了他在安徽宿州权篆，恰逢教匪王潮名袭城之后的烂摊子，上司令其追征当年钱粮四万两。高氏力争：“天庾正供何敢轻言减免，惟宿州春夏遭水继以兵乱……当奏请豁免，不则缓征以纾民力。”大府犹豫，他便再三力争。这一类决策表面是正堂官的事，但具体的奏稿、缓征清单、户口稽查，无一不落在他幕中的刑名、钱谷诸友身上。幕友与主人之间，时时存在着是否实数报销的争论。汪辉祖少年时在母亲面前许下的“不敢负心造孽”，到了具体的案牍之上，便落实为这一句句反复推敲的看语。奥德赛的考验，并不在风浪与怪兽之间，而正在这一笔一画的折狱、批驳、审转之中。

归来，晚年的著书与回望

奥德修斯归来，是张弓认妻、击杀求婚者。清代幕友的归来，往往是著书。

清代幕学一系书目，几乎都是由资深幕友在晚年写就的。汪辉祖有《佐治药言》《续佐治药言》《学治臆说》《学治续说》《学治说赘》；万维翰有《幕学举要》；王又槐有《办案要略》；张廷骧又辑入《入幕须知五种》。它们的体例多是札记式、条目式，把数十年游幕所得的经验、教训、规矩，分类列出，留给后来者。汪辉祖在《佐治药言》末说：“良药苦口而利于病，或未必无裨乎”。他自比药方，写给将来要走同一条路的年轻人。

把清代幕友的生涯称作“奥德赛时期”，并不是为了给它添一层史诗的光彩，而是想说明这的确是一段拖得很长的中间状态。这群幕友已经走完了少年读书的路，却没能获得正经的官身名分。他们既回不去做田舍翁，也站不到衙堂之上。整个壮年，就消磨在既非此岸、亦非彼岸的位置上。奥德修斯的故事之所以动人，不在他离家有多远，敌人有多凶猛，而在他始终带着一个“伊塔卡”，一个他必须回去的家。漂泊不是目的，而是为了带着新的眼光回到原点。清代幕友的伊塔卡，往往是士的本分，少年时读的是圣贤书，立志做的是修齐治平之业，可是中年漂泊于他人衙署，做的却是佐治之事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条看似偏离正途的长路上，他们以一支笔、一份札、一句剴切陈词，成为了清代地方治理中真正最贴近百姓生死的那群人。叶晟来源：澎湃新闻

马寅初携棺上台

1940年的一天，马寅初要在商学院大礼堂演讲。有人告诉他：台下混进了特务，情况很危险。马寅初没有退却。

演讲开始，他带着女儿和一口棺材走上讲台。满座愕然。马寅初开口便说：“为了真理，我不能不讲。我带了棺材，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；带女儿来，是让她亲眼看着，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，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。”台下鸦雀无声。

接着，马寅初话锋一转，针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状况、四大家族的企业与财产，一笔一笔算起了细账。他大声疾呼：“如今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了，还要这个捐、那个税！我要捐、要税，首先应该向四大家族开刀！”

掌声如春雷般响起，经久不息。混在台下的特务始终不敢下手。

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。接连派人去与马寅初“交谈”，以高官、美金为诱饵，劝他封口。蒋介石甚至开出三个职位任他挑选：中央银行总裁、财政部长、全国禁烟总监。马寅初都严词拒绝。

蒋介石又派人来请，说有要事叙谈。马寅初照样拒绝。来人问他为何不去，他淡然答道：“委员长是军事长官，我是个文职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。何况他是我学生，学生应当来看老师，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？”

1940年12月6日，马寅初被捕。囚禁于贵州息烽集中营。在狱中8个多月，他始终没有低头。

多年后，重庆大学的校园里建起一座“寅初亭”。亭子无声，纪念的是一位带棺材上台、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人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后人：有些话，再危险也要讲；有些事，再难也要做。周星